

JMLC

Journal of Maritim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JMLC*, Vol. 1, No. 2, 2026, pp. 240–249.**

Print ISSN: 3107-1821; Online ISSN: 3107-183X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mlc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mlc260222crrcm

HIEP
Academic Publishing

破灭、复现与残存：《吉姆爷》中的“救世主美梦”与帝国意识形态批判

丁礼明（Ding Liming） 王逸之（Wang Yizhi）

摘要：“救世主美梦”概念的提出能够概括《吉姆爷》中主人公吉姆所内化的帝国意识形态：一种源于 19 世纪英国的“进步”话语，以及在个体层面上再生产的殖民帝国主义的“英国梦”。通过分析小说中三层叙事结构，文章试图揭示吉姆心中的“救世主美梦”如何遭遇两次“信用破产”，并引发白人“帝国本我”共识圈的紊乱与修复尝试，最终催生了吉姆的两次误判与赎罪。而小说藉由叙述职能的层层让渡，将道德判断的“定夺”交由读者完成，进而实现对充满内在矛盾的帝国意识形态“救世主美梦”的元审判。

关键词：约瑟夫·康拉德；《吉姆爷》；“救世主美梦”；“英国梦”

作者简介：丁礼明（通讯作者），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英语文学研究。电子邮箱：18878331008@163.com。**王逸之**，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文学研究。电子邮箱：gentleleopard@sina.com。

Title: Collapse, Recursion, and Residue: A Critique of the “Messianic Myth” and Imperial Ideology in *Lord Jim*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the “Messianic Myth” serves to encapsulate the imperial ideology internalized by the protagonist Jim in *Lord Jim*—a colonial-imperialist “British Dream” that originated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Discourse of “Progress” and was reproduced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An analysis of the novel’s three-tiered narrative structure reveals how Jim’s “Messianic Myth” suffers two consecutive “credit bankruptcies”, triggering a disturbance within, and subsequent attempts at restoration by, the white-man “Imperial Self” as a community of consensus. These bankruptcies ultimately give rise to Jim’s two misjudgements and his

Received: 23 Aug 2026 / Revised: 31 Aug 2026 / Accepted: 22 Oct 2026 / Published online: 10 Nov 2026 / Print published: 10 Dec 2026.

atonement. Through the successive devolution of narrative agency, the novel leaves the final "conviction" as a moral judgement to the reader, thus carrying out a meta-judgment of the "Messianic Myth" as an imperial ideology riven with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Keywords: Joseph Conrad; *Lord Jim*; "Messianic Myth"; "British Dream"

Author Biographies: Ding Liming (Corresponding author),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English Literature. E-mail: 18878331008@163.com. **Wang Yizhi**, master's degree studen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English Literature. E-mail: gentleleopard@sina.com.

一、引言

《吉姆爷》（*Lord Jim*，1900）是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创作生涯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之作，也是英国现代主义小说谱系中绕不开的文本。学界对这部小说的阐释主要沿着三条路径展开：其一是叙事学研究，关注小说多层叙述框架、视角转换与不可靠叙述。朱安博、杜明业（2009）注意到康拉德叙述语言中的"含混、复杂、隐晦，甚至是错乱"；米勒（1992）则从重复理论出发，认为小说的开放时间结构使任何单一视角都难以成为可靠标尺。其二是后殖民与帝国意识形态批评，这类研究将小说置于英帝国扩张的历史语境中，揭示其如何暴露殖民话语的内在裂隙。皮克（John Peck 2001）指出，帕特纳号上的朝圣者代表了与西方职业伦理相对的宗教道德，而吉姆的失职恰恰揭示了航海小说赖以成立的"绅士"理想在新时期的失效；克里斯南（Sanjay Krishnan 2004）则从"动物"意象切入，分析叙述者对殖民地本土声音的系统性抹除与间或的"闯入"。其三是伦理批评，聚焦于吉姆的"误判"与"赎罪"行为所引发的道德判断难题。金泽尔（Paul Kintzele 2001）将小说定义为"一则关于定念/定夺（conviction）的故事"（76），认为吉姆既是他人解读的对象，也是不可被最终定性的"症候"；利维斯在肯定康拉德对商船伦理传统之信念的同时，也指出其笔下的道德成就总是与荒谬、虚幻相伴而生。

上述研究各有洞见，但存在一个共同盲区：它们多从外部视角（叙事策略、殖民语境、道德哲学）切入，却很少系统追问吉姆行为的内部驱动力是什么。换言之，吉姆为何在帕特纳号上弃船逃跑，又为何在帕图森岛上再次误判，最终以自毁式赎罪收场——这类问题往往被归因于"浪漫气质"或"怯懦性格"，而鲜有研究将吉姆的言行视作一种被特定历史话语塑造的意识形态内化结果。本文试图填补这一空缺，藉由提出"救世主美梦"（Messianic Myth）这一概念，用以概括吉姆所内化的帝国意识形态——一种发端于 19 世纪英国"进步"话语、在个体层面再生产为"帝国本我"的殖民-帝国主义时代的"英国梦"。

"进步"话语是 19 世纪英国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它将财富积累和社会变迁鼓吹为线性向上的幸福进程。殷企平指出，当时一批有良知的小说家对这种机械式进步展开了"推敲"，康拉德正是其中代表（2009），其写作延续了英国文学中"文化即秩序"的传统，对单向度的进步持批判态度（2017）。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进步"话语不仅停留在国家政策与思想精英层面，更通过海洋冒险小说、廉价读物、演讲等渠道向普通民众传播，在青年一代心中培植出"我是文明救世主"的个体迷思，即"救世主美梦"。这种美梦的实质，是自由主义经济成功（工业革命、海外扩张）与

种族主义优越论（白人至上、文明等级）的奇特结合，正如奥迪·克洛茨所言，其“两大支柱是种族和自由主义，这两样东西围绕着‘英国的本质为何物’这一核心连续不断地制造张力”（卡赞斯坦主编 111）。

本文的分析策略是：依据小说叙事方式的两次重大转变，将全文分为三个环节，分别对应“救世主美梦”的破灭（第一环节）、复现与紊乱中的修复（第二环节）以及残存与“定夺”吁请（第三环节）。第一环节（第 1–4 章）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表面上仿写海洋冒险小说范式，却暗中以帕特纳号的锈蚀、船员的粗鄙和吉姆的跳船，解构“进步”话语所许诺的英雄形象。第二环节（第 5–35 章）引入马洛的第一人称追述，这一叙述职能的让渡本身即是“帝国本我”共识圈在遭遇“信用破产”后陷入紊乱的症候；马洛不断复述“我们中的一员”，恰恰暴露了种族主义共识的脆弱与建构性。第三环节（第 36–45 章）进一步让叙述权转移至一位无名读信人，小说借此邀请读者对吉姆的两次误判与最终赎罪作出“定夺”——这是对“救世主美梦”本身的元审判。

通过上述三重叙事结构的逐层分析，本文将论证：《吉姆爷》既展示了“救世主美梦”如何在个体层面再生产、失败、再修复、再失败，又通过叙事职能的层层让渡，将道德判断的最终权力交给读者，从而完成了对这套充满内在矛盾的帝国意识形态的深刻批判。这一解读路径不仅有助于重新理解吉姆这一人物的悲剧逻辑，也为审视康拉德小说中帝国话语与叙事形式之间的张力关系提供了新的切口。

二、“救世主美梦”自由主义起源的停滞

可将《吉姆爷》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叙述方式的第一章至第四章命名为小说的第一环节。这一环节讲述了有关主人公吉姆即将遭遇的帕特纳号船难及其跳船逃跑的第一次“信用破产”的背景信息，实际上是藉由对英国航海冒险小说写作范式的戏仿与解构，描绘帝国“进步”话语的再生产失败，进而剖析“救世主美梦”的内在缺陷。

所谓的“进步”话语（Discourse of “Progress”），是 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期英国国家层面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宏观思潮的渊薮在于英国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所带来的种种进步成果，主要倾向是歌颂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国内工业化的推进、社会状况的革新以及国外的海外扩张、财富的掠夺与积累，重要特征是将英国为推进自身殖民-帝国主义发展所采取的各种行径正当化、合理化。而“救世主美梦”正可视作英国“进步”话语这种国家意识形态倾向在个体层面的民众个人身上的一种再生产成果。具体而言，“进步”话语利用时兴的海洋冒险小说作为自身再生产的一大凭借，在向有志于出海远航的英国青年培育“英国民族特有的商船伦理传统（traditional ethics of British Merchant Service）”（李文军 《论约瑟夫·康拉德的英国文化身份》 356），传递强调“认真、执着而理性”（胡强 82）的水手航海精神的同时，又或明或暗地在此类作品中植入符合帝国期待的“进步”观念，藉由“象征着‘进步’的白人救世主同妨碍了帝国进步大业的、非白人的大敌相抗争，并在非白人群体中提携那些有望进步的待救者，最终实现合乎帝国利益的伟大胜利”这一类故事模板来弘扬“冒险性男性气概”（邓颖玲、石嘉璇 45）、塑造白人“救世主”英雄，进而在那些英国青年，乃至更广大的英国白人民众心中塑造出符合英帝国殖民主义“进步”观念的“救世主美梦”。

至于“进步”话语这一术语，则来源于殷企平的相关论述。殷企平指出，19 世纪英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将财富积累置于首位，鼓吹一种“人类社会因财富的无限增长而无止境地朝着幸福状态

进步”的宏伟构想（殷企平 《推敲“进步”话语》 4）。与此同时，一批有社会责任感的小说家开始对这一话语展开“推敲”，康拉德正是其中的代表。正如殷企平所论，康拉德的写作延续了英国文学中“文化即秩序”的传统，对机械式的社会进步持批判态度（殷企平 《文化即秩序》 106–107）。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救世主美梦”作为“进步”话语在个体层面的再生产成果，用以阐明吉姆的意识形态内化过程。而《吉姆爷》的第一环节则对海洋冒险小说中关乎“进步”话语的移植与“救世主美梦”的生成的惯常写作程式进行了明显的仿写与暗中的消解。事实上，若从殖民-帝国主义“进步”观念之再生产的角度来看，“《吉姆爷》提供了一个尤为清楚的例子——一个未能直面难关的水手”（Peck 120）。而这种同航海幻想严重相违的救世主失范，其肇因既在于帕特那号及其船员的浪漫缺失，更在于吉姆本人的浪漫过剩。

从表面来看，小说第一环节采用了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进行叙述，如常见的航海冒险小说一般反映着帝国意识形态再生产流程的稳固、确定与理所当然；在其中的第一章至第三章当中，更是不遗余力地描绘了主人公吉姆在“看了一些供假日消遣的文学作品，明确了要以海为业之后”（康拉德 2）受到激发，致力于培植以及实现自身的“救世主美梦”的狂热状态，使得一位（自以为）能够恪尽职守、不畏难关的英国白人“救世主”即将塑造成功。就如同萨特南·桑格拉在其专著（2025）中指出的那样，帝国“进步”观念向民众的传播正是“通过飓风般的廉价读物、戏剧、小册子、地图[等一系列意识形态的文献载体]而得以传播”（151）。但从实质来看，第一环节叙述的真正目的是意欲冲击、解构那些符合帝国期待的殖民冒险叙事程式，借助吉姆这样一个代表着帝国“进步”观念再生产失败的、救世主失范的样本，为之后两个环节对“救世主美梦”内在缺陷的批判与审思做好预备。

先从船及船员来看：不同于过往殖民英雄的完美座驾，吉姆的船“比没人要的水罐还不如”（康拉德 8），显然是“作者试图通过帕特那号的锈迹斑斑隐喻英国航运的衰败以及整个帝国殖民体系的风雨飘摇”（李锋 76），藉由一艘船的破旧来表现整个“救世主美梦”的过时；船长和其他船员更是在存在上就隐喻了英国维多利亚晚期的航海职业危机，“不属于英雄冒险的世界”“活像个猪油雕成的笨拙的人像”的德裔船长更是直接将八百多名像货物般登船的朝觐客们称呼为“这群畜牲”（康拉德 9），同殖民主义的冒险神话于表象上便相去甚远，于内在却又无比贴近。再从吉姆本人来看，这位自命的“救世主”只能在平日里“满怀慷慨的激情，想着自己是多么优秀”（康拉德 14），在危难关头却与另外四名白人船员同样背弃职守。可以说，吉姆只是在表面上看似延续了帝国“进步”话语下的航海英雄形象书写，但在本质上却是这种意识形态再生产失败的残次品，也是“他自身内部黑暗力量的牺牲品”（米勒 87）；他悲剧的源头，“在于他的浪漫气质，在于他将自己视为英雄这一天真的影像，这一影像可在那些虚假骗人的文学作品中找到它的来源”（Ibid.），结果却在“进步”话语的断裂与“救世主美梦”的破灭中陷入紊乱。

三、“救世主美梦”种族主义理据的紊乱

整部小说自第五章开始在叙述方法上的明显改变，正可视为“救世主美梦”的白人共识圈，针对“吉姆面对船难却弃船逃跑”这一有悖“美梦”要求而招致共识圈内部紊乱的意外事件所作出的应对与审视。小说的第五章至第三十五章可称之为第二环节，其中虽然还在表面上保留了第一环节的第三人称全知叙述框架，但实际上已将叙述的职能“让渡”给了向一众听众进行第一人称陈述的

海员马洛。而在小说未有叙述的“暗中”要求马洛开展思考调查与回忆的那个白人“救世主”共识圈，则可被称为“帝国本我”（Imperial Self）——若将“进步”话语看作“美梦”自由主义的产生缘由，那么“帝国本我”则可视为“美梦”种族主义的维系理据。

“帝国本我”一词借自奥迪·克洛茨在文编《英美文明与其不满者》（卡赞斯坦主编 106）之第四章中的论述。概言之，“帝国本我”可视为“救世主美梦”由个体层面重又返回到集体层面时所激起、塑造的一个共识。这个共识针对的是白人“救世主”共识圈中“我们感”（we-ness）的建构，以种族主义、帝国主义色彩为显著特征，实际上揭示了 19 世纪晚期至 20 世纪“‘盎格鲁’共同体的流动本质及变化范围”（106）。也即，同样保持着“我是象征着‘进步’的白人救世主”这一信念的众多个体，以种种方式产生了联系与共鸣后，自然会导致相互间的认可以及对自我的确证，进而由个体到集体，使“我”成为“我们”，“我们感”得以涌现。而这种“我们皆为‘救世主’”的迷思，在成形后为了维系、巩固自身的存在，主动选择了种族主义作为其“理论支撑”，一方面用“进步-非进步”的二元对立范式划分白人与非白人，显示出“在帝国主义的想象中，只存在两种状态：支配与顺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芬坦·奥图尔 转引自 桑格拉 171）；另一方面也在白人内部划定隐形的界限，将吉姆这种有悖于“美梦”要求，遭受了“信用破产”的非进步角色逐出“救世主”的共识圈，使其脱离“帝国本我”所建构出的“我们”，好将“帝国本我”自身由紊乱恢复为稳定。

吊诡的是，导致“进步”话语再生之失败、“救世主美梦”无法成真而使得“帝国本我”陷入紊乱的，吉姆本人弃船逃跑的“第一次信用破产”，在第一环节处于一种空缺的状态；这一环节当中代表着帝国主义“进步”观念的第三人称全知叙述，于第三章末尾提到状况的突变与灾难的骤生后，几乎唐突地于第四章将叙述跳跃到“大约一个月以后”（康拉德 19），已然造成了一种叙述的断裂。由于这种断裂的存在，吉姆遭遇船难而弃船逃跑的真正经过以及理由被迫遁入黑暗的中心，不被符合“进步”话语的固定叙述程式所接受，只能在同属“帝国本我”的种种的“我”——出席对吉姆的审判的其他白人——的审视中得到回溯性的反复建构，进而构成了“一连串的重复，每个事件都可回溯到其他事件……每个事件都作为无穷无尽地回归前行这一过程的一部分而存在”（米勒 90），却又始终无法真正触及那个缺失的事件源头。在这种断裂发生之后，受到冲击、陷入紊乱的“帝国本我”共识圈才能容许马洛的出场，使他能够在代表着白人“救世主”主流态度的法庭定罪之外对异质的吉姆展开异质的思考。

整个第二环节的核心，正在于马洛带在嘴边的那句“我们中的一员”（one of us），这句用以定性的短语“事实上就是一种条例和尺度，一种划分界线的标准与依据”（李文军 《康拉德小说中“我们的一员”的文化含义辨析》 68），一种马洛对吉姆作出的充满矛盾对立的定夺。关键时刻救世主失范而遭信用破产的吉姆，违背了来自自由主义“进步”话语的期待，从而被驱逐出了种族主义的“帝国本我”共识圈，但吉姆受到的期待更多是源于其身上种族主义的白人“救世主”特质。在这种自由主义与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再生产循环现在所处的紊乱状况中，马洛似乎注意到了处于状况中心、作为紊乱缘由的吉姆心中所残存的、对于“救世主美梦”的期待和遗憾，从而在同吉姆偶然搭上话后，愿意同他在远离作为“帝国本我”大本营的法庭的餐厅与旅馆内进行交流，以及帮他寻觅机会、兜水上生意，以使得吉姆能够重新参与到“进步”话语的再生产之中。

马洛对吉姆的关注最直接的表现，正在于马洛掌握了第二环节的叙述职能，由澄清吉姆对船难的具体经过与细节、展开回忆来对第一环节中的叙述断裂进行回溯性建构，以避免让吉姆“滑到那

黑暗中”（康拉德 27），以“力图维护[马洛]他对神圣原动力的信仰”（米勒 89）。但正如“救世主美梦”这种帝国主义的神圣原动力无法剥离其自由主义源头与种族主义色彩一样，吉姆的（乃至马洛自身的）回忆性叙述同样无法远离对“美梦”之信仰的眷念：吉姆的回忆式陈述中充满了对自己救世主失范的评价，追悔自己“失去了一个多好的机会”（康拉德 57），抱怨“一切都背叛了他”（65），但对于真正重要的自己跳船逃跑的理由与细节却始终在回避回忆，毕竟这不符合“美梦”的要求；马洛虽然始终将吉姆称为“我们中的一员”，却也在自己后来向无名的听众们诉说之时承认他无法解释清楚作出如此判断的理由（康拉德 101），这么做或许是由于相同的种族与国籍，或许是出自对同持“美梦”之人的关心，又或许只是因为马洛想要改变由于吉姆等人弃船逃跑、泛舟海上而生出的“死一般的平静”（康拉德 88）——由于“进步”话语再生产失败，“帝国本我”共识陷入紊乱、亟需审视所生成的，救世主缺位的无意义空间。

除此之外，第二环节中马洛的讲述之内，除却吉姆本人的供述，同样存在着众多因“帝国本我”的紊乱才能够出现的异质性声音，共同消解着救世主美梦赖以立论的基础。桑杰·克里斯南（Sanjay Krishnan）指出，小说第六章的“黄狗事件”直接促成了马洛与吉姆的第一次交流，实质上“扰乱了马洛的叙述”（337），而在那条在庭审结束、众人离场时突然窜出的黄狗，实质上代表了常被“美梦”的种族主义导向所忽视的，船上八百多名非白人乘客的声音。杰里米·霍索恩（Jeremy Hawthorn）注意到，第十二章马洛偶遇并简单交谈的一位法国中尉，既补充了船难的后续情况，也在其对吉姆的评价中折射出“进步”话语自身的僵化——“不能跨出或超越某一套僵死的职业矩度”（22），去理解吉姆这种违反却又坚持着“美梦”的矛盾形象。此外，第十四章的彻斯特对于吉姆痛苦乃至海员资质的不屑一顾，以及他对出海航行工作的随意态度，则直接揭示了“帝国本我”共识的内生缺陷，从根本上消解了白人“救世主”的“进步”基础。至于第二十章起开始与马洛交流的白人富商斯坦因，在结构上作为第二与第三环节的中转与过渡，在主旨上则点明了吉姆的“标本”性质（康拉德 147），并注意到那个纠缠着吉姆的“破坏性的东西”（destructive element, 152）。特蕾莎·加拉格尔（Teresa Amador Gallagher）更是指出，斯坦因的真正作用并非点明“标本”性质即止，而是藉由马洛的视角，使小说的叙事框架由收缩（contracting）转向扩张（expanding, 44），使吉姆不只是斯坦因房间中从墙壁到书架、从盒子到蝴蝶标本的一个讨论符号，而能够在“框架之间的运动”（41）中保持“活跃、动态和自由”（50）。由此，“帝国本我”共识才得以暂时摆脱紊乱，决定向吉姆进行再一次“投资”。可以说，正是凭借着马洛与斯坦因的交流，“帝国本我”才能够暂时地摆脱紊乱，决定向业已“信用破产”过一次的吉姆再进行一次“投资”，要他在斯坦因所涉足过的帕图森岛上恢复“救世主美梦”；而吉姆自己也意欲借助前往帕图森来摆脱他那不堪回首、屡次逃避的过去，“要留在这儿”好“背水一战”（235），从而真正成为“我们中的一员”。

四、对“救世主美梦”的“定夺”吁请

之所以将小说的第三十六章至第四十五章划分为第三环节，不仅是因为其中某个“受到特别对待的人”（康拉德 244）的突然登场，更是由于在这种叙事方式之改变的暗中所潜藏的宏观话语的悄然转移，以及对于能够基于新的共识来对吉姆作出“元审判”（meta-judgment）的读者所发出的“定夺”请求。需被“定夺”的对象是吉姆之中名为“救世主美梦”的“定念”，而无论是“定夺”还是“定念”，在英语中都可以用 conviction 一词表示，所关乎的都在于某种“理所应当”。所以正如保

尔·金泽尔（Paul Kintzele）在其论文中指出的那样，从总体上看，“《吉姆爷》是一则有关定念/定夺的故事”（a narrative of conviction, 76）。至于小说的第三环节，既在叙述内容中展现了“定念”的内生悖论与“定夺”的十分必要，又籍由新的叙述方法折射出对“定念”的矛盾态度与最终“定夺”的难以实现。

整部小说惯常的划分方法是基于吉姆的行迹，以第二十章马洛同斯坦因见面为界线，划分出“帕特那号故事”与“帕图森岛故事”两大部分，核心意图在于籍由叙述吉姆重复性的“信用破产”，来反映出驱使他行动的“救世主美梦”的内在矛盾。而本文选择基于叙事方式变化的另一种划分方法，将整部小说划分为三大环节。这么做不仅是为了分析第一、第二环节中显示出的“救世主美梦”的流通过程与再现失败，更是意在探寻第三环节叙述方式中所蕴藏的、邀请读者对吉姆生平作“定夺”、对“救世主美梦”作元审判的写作设计，进而以更高、更全面的视角看待吉姆两次“误判”的不可避免与选择“赎罪”的反讽内核，并且以更为历史、辩证的态度看待作为整部小说原动力的、名为“救世主美梦”的“定念”。

相较于前两个环节，第三环节的不同之处在于整个全知叙述底层框架在这里的改变：在第三十六章，马洛终于结束了其自第二环节以来的陈述，听众们四散离场，而其中一个“受到特别对待的人”在陈述的两年多以后突然来到马洛家中，开始阅读马洛留给他的信件。信中马洛称只有这位特别的听众“自始至终对他[吉姆]表示了兴趣”（康拉德 245），正如同样持书阅读的读者仍然在阅读《吉姆爷》一般。在这一环节，昔日的“进步”话语与马洛本人一并消失无踪，虽然后者对吉姆故事的回忆式陈述仍然以信件形式得以保留，但却成了那位特别听众主动寻觅并展信阅读的结果；这个听众实际上也只是个供人“代入”的空壳，小说的读者在利用之时，正是要或自发或自觉地基于自身真实环境所提供的、有别于帝国“进步”话语的另一种话语来审视吉姆的作为乃至马洛的态度，进而使小说中最终“定夺”权力的让渡能够实现。

概言之，正是暗中控制着小说叙述的宏观话语的变动造成了“定夺”的转移，而需被“定夺”的则是吉姆“定念”的两次复现失败，以及由此造成的两次“信用破产”：吉姆的第一次“信用破产”，在于他在帕特那号遭遇船难时背弃职守的那一跳——第一环节于锈船轰然停下的那一刻戛然而止，掌控着这一环节、如惯常的海洋殖民冒险小说那般讲述着主人公吉姆光辉出航的帝国“进步”话语同样陷入了停滞，依托“进步”话语而生的“救世主美梦”复现失败，因此陷入紊乱的、名为“帝国本我”的救世主共识圈便只能在第二环节将文本的焦点对准马洛，容许他对着一众人等回忆自身经历，实质上是将叙述的职责让渡给马洛，要他以第一人称个人化的视角对吉姆进行问询、转述吉姆对他的坦白，并且在暗中驱使马洛四处辗转，搜集各色人物对于吉姆的看法，进而在第二十章同斯坦因见面并达成初步的意见。而吉姆的第二次“信用破产”，正在于他到达帕图森群岛后，应对海盗危机的最终失败。凭借着马洛的推荐与斯坦因的赞助，吉姆才能够顺利登陆岛屿并取得当地土人信任，甚至被尊为“爷”（*Tuan*/Lord）。在第二十一至第三十五章，马洛则在其讲述中试图以复演来修复业已停滞、锈蚀的帝国“进步”话语，继续以模仿殖民开拓冒险故事的口吻来回忆吉姆如何为岛民建功立业，使得“他的话日复一日被奉为惟一的真理”（康拉德 194），又或是以对爱情故事与拯救叙事的模仿来叙说吉姆如何凭自己那“带有浪漫色彩的良心”（197）与勇气，从一个卑鄙堕落的白人父亲手中救出自己日后的混血妻子“珠宝”。可以说，第二环节二十章以后的部分之于第三环节，就相当于第一环节之于第二环节的先前部分——同样是借助讲述背景信息来将吉姆塑造为

“救世主”的雏形；同样是藉由回溯性的建构来补充与追叙那个妨阻“救世主美梦”成真的、扰乱“帝国本我”共识圈的灾难事件。并且，同样是由于灾难事件的遽然出现，导致了小说环节变化的发生与叙述方式的变化；同样是因为引发了这一切却又总在叙事黑暗的中心的“只有康拉德自己才明白的秘密”（米勒 89），使得来自“故事外”之人物的“定夺”成为必要。

而第三环节引发了吉姆再一次“信用破产”的白人海盗头子布朗，在功能上相似于第一环节末尾的船难，但在性质上又有所不同。虽然二者都扮演着妨碍“救世主”大业实现的大敌，但海灾船难仅是冒险英雄理应经历并克服的一个外在事件，而海盗布朗则是整个白人“救世主美梦”之内刻意忽视却又无法切割的暗面——顺应自由主义经济进步而生，却又代表着“以掠夺他人土地财富、剥削压迫异族他者甚至英国同胞为表现方式的人性的‘退步’”（徐彬 115）；合乎种族主义推进扩张的要求，却又因其必然的残暴与压迫而被“帝国本我”共识圈所有意遮掩。换言之，布朗在功能上居于吉姆的对立面，但在性质上又因共同的白人肤色而同“救世主美梦”相关联，折射出“美梦”作为殖民-帝国主义时代“英国梦”的内生缺陷。当布朗作为海盗头子在船内指挥众贼攻岛时，他毫无疑问是破坏吉姆爷建设的大敌。但当布朗伪装成落难的白人船员，终于在岛上同吉姆见面并交流时，这两人却吊诡地共同成为了“我们中的一员”——“在[吉姆和布朗]这粗鲁的谈话中，也有一条脉络，微妙地提到他们共同的经历；还令人作呕地暗示他们有共同的愧疚，有不能为外人道的心事，它就像一条纽带，将他们的思想和心连在一起。”（康拉德 281）

藉由马洛的回忆性叙述，读者能够注意到，“作为一个白人，吉姆认为自己有责任拯救自己[落难]的同胞，错误地放走了布朗一伙，导致了自己的毁灭”（李文军 《康拉德小说中“我们的一员”的文化含义辨析》 69）。也即，导致了吉姆岛上的误判的，既是吉姆、布朗共同的白人肤色，也是吉姆因自己曾经船上的误判而生的、对布朗落难船员之伪装的不恰当的共情。吉姆当初因误判而弃船逃跑，引发了他在白人“帝国本我”共识圈中的第一次“信用破产”。为了修复“信用”、实现“美梦”，吉姆选择在岛上扮演名叫“吉姆爷”的白人“救世主”以期赎罪。“然而关键在于，在这人世间，吉姆除了跟他自己，再不跟别人打交道”（康拉德 245）。吉姆选择赎罪的立足点，始终是为了服务于帝国白人的“进步”话语，而非“帕图森的生活”与“人们的信赖、爱戴和友爱”（275）。这种立足点的局限使得吉姆于关键时刻反倒同布朗结成了“我们”，在处置布朗一伙的问题上作出了误判、放跑了群匪，成为了同大部分岛民意见相悖的“他们中的一员”，进而导致了自己的第二次“信用破产”——吉姆的误判直接导致了不久后海盗的骚乱与杀戮，最终使吉姆丧失了岛民们的信任——“一切都完了，曾经有一次未能忠于职守的他，再次失去了所有的人对他的信任。”（康拉德 297）

小说最后的第四十五章，展示了吉姆最后的赎罪——他选择直面欲问其罪的土人首领，并自愿被后者枪决。而驱动了这种选择的故事动力，依然可以解释为吉姆的“救世主美梦”：这种源于虚假冒险故事的欺骗话术，在吉姆这个人身上转化为“崇高的自我主义”（康拉德 302），要求他向一个“既不关心吉姆、又丝毫不需要他的整个世界”（223）作出牺牲，甚至不惜抛下爱妻与忠仆。而展现了吉姆最终选择的整个叙述模式，则是读者“主动”开始阅读的马洛的信件。“那位得到特权的读者”（254）在第三十七章就知道了整个“吉姆故事”的余波：布朗在马洛采访完的当晚就死了；斯坦因变得憔悴；“珠宝”更是陷入了漫长、冰冷的哀痛当中。第三环节的“帕图森岛故事”与第二环节的“帕特那号（及之后的）故事”一并成为马洛所追忆与整理的过去，更是留出“特权读者”这样一个“虚位”以待小说真正的读者占据而介入叙事，进而实现对于整个“吉姆故事”的元审判。

可以说，“吉姆是书中其他角色，乃至小说本身的症候（symptom）之所在”（Kintzele 74），而对吉姆名为“救世主美梦”的“定念”作出最终“定夺”的道德需求也同样逐步从书中传递到书外。惯常的第三人称全知叙述在第一环节后便骤然解体；第二环节叙述的职能被变相地让渡给了马洛，故事的范围也随之缩小到马洛充满“含混、复杂、隐晦，甚至是错乱”（朱安博、杜明业 15）的回忆与转述之上。实质上，马洛也是供小说作者康拉德占据的一个“虚位”角色，而“马洛阐述吉姆的权能，就同吉姆阐述自己的权能一样，都是一种幻影”（Levin 67）。一方面，马洛因为吉姆的“定念”而将其称为“我们中的一员”；另一方面，他又对从属于帝国的、过于浪漫化的“我们感“产生了犹疑。终于在第三环节，“定夺”的需求被变相移交到了小说真正的读者手上。无论潜藏在吉姆之中的是他过于浪漫的“对神圣原动力的信仰”（米勒 89），还是“他对来自失败或自私的污点的恐惧”（Kintzele 71），吉姆身上由“救世主美梦”所催生的“一种不可思议的神秘”（康拉德 254）已成为了或许能够超越培育了“美梦”的英帝国主义境况，实现更为全面、公正的元审判的真实读者们“定夺”的对象，而“定夺的存在正彰显了：完结永不会驻足于结尾”（Kintzele 76）。

Funding: This research received no external fundi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s of interest.

ORCID

Ding Liming [ID] https://orcid.org/0009-0000-7859-4951

Wang Yizhi [ID] https://orcid.org/0009-0006-4865-0581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约瑟夫·康拉德：《吉姆爷》，熊蕾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年。

[Conrad, Joseph. *Lord Jim*. Translated by Xiong Lei.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4.]

邓颖玲，石嘉璇：《维多利亚晚期英国海洋小说中的公民教育》，《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 3 期，2023 年，第 44–52 页。

[Deng, Yingling and Shi, Jiaxuan.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Late Victorian British Sea Novels.” *Journal of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no. 3, 2023, pp. 44–52.]

Gallaghe, Teresa Amador. “Out of Our Depth: Physical Space and Frame Narration in *Lord Jim*.” *The Conradian*, vol. 38, no. 1, 2013, pp. 39–52.

Hawthorn, Jeremy. “The Expression ‘*roulé ma bosse*’ in Joseph Conrad’s *Lord Jim*.” *The Conradian*, vol. 45, no. 2, 2020, pp. 16–23.

胡强：《康拉德与英国》，《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 3 期，2004 年，第 81–84 页。

[Hu, Qiang. “Conrad and England.” *Journal of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no.3, 2004, pp. 81–84.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722X.2004.03.018]

彼得·J. 卡赞斯坦主编：《英美文明与其不满者：超越东西方的文明身份》，魏玲、王振玲、刘伟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

[Katzenstein, Peter J. (Ed.). *Anglo-American and Its Discontents: Civilizational Identities beyond West and East*. Translated by Wei Ling, Wang Zhenling and Liu Weihua.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8.]

Kintzele, Paul. “*Lord Jim*: Conrad’s Fable of Judgment.”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2001, vol. 25, no. 2, pp. 69–79. DOI:

http://doi.org/10.1353/jml.2003.0006

Krishnan, Sanjay. "Seeing the Animal: Colonial Space and Movement in Joseph Conrad's *Lord Jim*." *NOVEL: A Forum on Fiction*, 2004, vol. 37, no. 3, pp. 326–351. DOI: http://doi.org/10.1215/ddnov.037030326

F. R. 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年。

[Leavis, F. R. *The Great Tradition*. Translated by Yuan We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9.]

Levin, Yael. *Joseph Conrad: Slow Modern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DOI: http://doi.org/10.1093/oso/9780198864370.001.0001

李锋：《现代主义早期文学中的"英国病"、国家干预理念与金融帝国构想》，《外国文学研究》，第 4 期，2024 年，第 74–85 页。

[Li, Feng. "'British Disease', Ideas of State Intervention, and Imagination of Financial Empire in Early Modernist Liter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no. 4, 2024, pp. 74–85. DOI: https://doi.org/10.19915/j.cnki.fls.2024.0052]

李文军：《康拉德小说中"我们的一员"的文化含义辨析》，《英美文学研究论丛》，第 2 期，2021 年，第 66–78 页。

[Li, Wenjun. "A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One of Us' in Conrad's Fiction."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no. 02, 2021, pp. 66–78. DOI: https://doi.org/10.16754/b.cnki.ymwxyjlc.2021.02.007]

——：《论约瑟夫·康拉德的英国文化身份》，《英美文学研究论丛》，第 1 期，2023 年，第 353–364 页。

[---. "On Joseph Conrad's English Cultural Identity."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no.1 2023, pp. 353–364. DOI: https://doi.org/10.16754/b.cnki.ymwxyjlc.2023.01.019]

J·希利斯·米勒：《<吉姆爷>：作为颠覆有机形式的重复》，王宏图译，《文艺理论研究》，第 4 期，1992 年，第 86–92 页。

[Miller, J. Hillis. "*Lord Jim*: Repetition as Subversion of Organic Form." Translated by Wang Hongtu.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no. 4, 1992, pp. 86–92.]

Peck, John. *Maritime Fiction: Sailors and the Sea in British and American Novels, 1719–1917*. Palgrave, 2001. DOI: http://doi.org/10.1057/9780333985212

萨特南·桑格拉：《帝国之境：帝国主义如何塑造了现代英国》，李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 年。

[Sanghera, Satnam. *Empireland: How Imperialism Has Shaped Modern Britain*. Translated by Li Hu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25.]

徐彬：《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旅行冒险与殖民流散小说中的帝国意识形态》，《外国文学研究》，第 2 期，2025 年。第 113–124 页。

[Xu, Bin. "Imperial Ideology in Victorian British Novels on Travel Adventure and Colonial Diaspora."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2025(02), pp. 113–124. DOI: https://doi.org/10.19915/j.cnki.fls.2025.0021]

殷企平：《推敲"进步"话语——新型小说在 19 世纪的英国》，商务印书馆，2009 年。

[Yin, Qiping. *Refining the Discourse of "Progress": The New Novel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9.]

——：《文化即秩序：康拉德海洋故事的寓意》，《外国文学》，第 4 期，2017 年，第 104–111 页。

[---. "Culture Is Order: The Moral of Conrad's Sea Stories." *Foreign Literature*, no.4, 2017, pp. 104–111. DOI: https://doi.org/10.16430/j.cnki.fl.2017.04.012]

朱安博，杜明业：《"背叛与决裂"——康拉德小说的叙述语言》，《外国语文》，第 3 期，2009 年，第 12–17 页。

[Zhu, Anbo and Du, Mingye. "'Treachery and Rupture': Conrad's Narrative Language."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o.3, 2009, pp. 12–17. DOI: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4-6414.2009.03.003]